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年历程

(1898—2000)

【德】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 著
山东大学课题组 译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年历程
(1898—2000)

【德】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 著

【德】于尔根·科卡 【德】沃尔夫冈·J.蒙森 修订

【美】阿兰·诺特纳格 德译英

山东大学课题组 英译汉

图字 01-2014-035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年历程: 1898~2000 / [德] 埃德曼著; 山东大学课题组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书名原文: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ISBN 978-7-5161-6808-0

I. ①国… II. ①埃…②山… III. ①史学—学术团体—概况—1898~2000 IV. ①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1364 号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37.75
插页 2
字数 640 千字
定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 – 2000

Written by Karl Dietrich Erdmann

Edited by Jürgen Kocka and Wolfgang J. Momms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Agnes Blänsdorf

Translated by Alan Nothnagle

Published in 2005 by

Berghahn Books

根据 Berghahn Books 2005 年版译出

中译本序

原书是著名德国史学家、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所撰的一部史学史著作，记载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组织架构自草创至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其书名为《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Die Ökumene der Historiker*）。^① 20世纪9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局成员沃尔夫冈·蒙森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提议将本书从德文译成英文。在阿格内斯·布伦斯多芙的协助下，科卡和蒙森对原书做了编订，蒙森撰写“补遗”一章，记录了大会从80年代到2000年奥斯陆大会的发展历程，最后由阿兰·诺特纳格^②翻译成英文。^③ 中译本即由此英译本转译。

英文版主要编订者于尔根·科卡和沃尔夫冈·蒙森都是著名的德国史学家；埃德曼和科卡长期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事业效劳，为构建一个“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做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这部著作凝结了积极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事务的两代学者的心血，无疑是中国学人进一步了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个窗口，也让课题组在翻译过程

① 本书英文版书名可以直译为《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1898—2000）》，为简明起见，中译本书名译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年历程（1898—2000）》——译者注

② 曾在法兰克福一所大学任职，后辞去教职并开设翻译事务所，从事各类翻译工作。

③ K. D. Erdmann,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 - 2000*, edited by J. Kocka, W. J. Mommsen and Agnes Blänsdorf, translated by Alan Nothnagl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ix - xii.

中获益良多。现谨撰此序言,谈一谈翻译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埃德曼原书记载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发展历史上的两大主题。其一,是在20世纪早期动荡的国际局势中为创建国际性的史学家交流平台、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做的努力;其二,是在“二战”后,尤其是冷战期间为促进东西方史学交流、弥合意识形态鸿沟所做的尝试。蒙森在“补遗”一章中对这两大主题做了精炼的概括。^①大会从1990年至2000年的发展又体现了一些新的特色,即史学研究与会活动组织数字化、参与成员年龄结构年轻化和研究旨趣的大众化。在这个新发展时期,大会也从其过去的历程中继承并发扬了两大优良传统,一是对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入反思,二是其国际化和普世化使参会者及话题覆盖到尽可能广的地理范围。

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the ecumenic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其具体内涵是在史学研究中超越国界、种族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偏见,促进全世界史学家在研究旨趣、方法论乃至个人政见上的相互理解与包容;同时,不论在研究人员还是话题上都尽可能广地拓展史学研究所覆盖的地理范围。这也是一代又一代史学大会人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从20世纪初活跃在大会舞台上的加布里埃尔·莫诺、亨利·皮雷纳和亨利·贝尔,到两次世界大战间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草创付出艰辛努力的哈尔夫丹·科特、瓦尔多·利兰和汉斯·纳布霍尔茨等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先驱们一直在为超越民族主义、超越狭隘的国别史视角奋斗。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在“二战”后完成组织重建并进入冷战时代后,以米歇尔·弗朗索瓦、玛丽亚·潘克拉托娃和卡尔·埃德曼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东西方史学家也为克服政治摩擦的不良影响并促进不同理论视角的互动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冷战后的新发展也继承了这个“普世”的趋势,即促进研究地域的拓展、不同理论方法论的沟通以及学术精英与普罗大众的交流。

理论与方法论的讨论是大会一贯的传统。从20世纪初的“方法论

^① Erdmann, et al,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pp. 313—315.

之争”、关于普遍与个别的讨论,^①到“二战”后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历史主义等各种史学思潮的角力,大会关于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史学界方法论思考的大势。^②我们需要细心留意的一点是,大会上方法论话题的演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是一个新旧史学思想在相互竞争中取长补短、相互交融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历史叙事以及“事件的历史”曾受到年鉴学派等新思潮的强力挑战,布罗代尔甚至不屑一顾地把前者称作“老爹的历史学”,^③暗批其过时。但传统史学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与其他的研究视角取长补短后在巴黎大会“大放异彩”,^④并在此后历届大会中延续了它的生命;在1990年马德里大会上,在传统史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话题。^⑤另外,一些学术理念可能十分先锋,然而它要等到几十年后才能大规模地开花结果。早在20世纪初,法国人亨利·贝尔就十分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综合”的概念,希望融多种新旧史学方法为一体,用更全面的视角考察历史;^⑥他在早期的国际史学大会上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推广这种学术理念。然而,历史学各个分支领域打破藩篱、相互交融,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直到最近40年才逐渐兴盛并产出大量成果。以英国近代早期的史学研究为例,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才越来越多地关注政治史、文化史的融合^⑦以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⑧

① Erdmann, et al,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chs. 2, 3, 5.

② Ibid., chs. 13, 17.

③ Ibid., p. 279.

④ 埃德曼语。Ibid., p. 214.

⑤ Ibid., pp. 323, 336.

⑥ Ibid., pp. 18 - 19.

⑦ 比如关于大众政治或政治文化的研究,例如 David Underdown, *Revel, Riot and Rebellion: Popula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England, 1603 - 1660* (Cambridge, 1985); Peter Lake and Kevin Sharpe (ed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tanford, 1993) .

⑧ 例如 Kevin Sharpe and Steven Zwicker (eds.), *Politics of Discourse: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Seventeenth - Century England* (Berkeley, 1987); idems., *Refiguring Revolutions: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English Revolution to the Romantic Revolution* (Berkeley, 1998) .

又或是以更宽广的地理视角考察历史^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一个不同的经典史学思想相互碰撞、交流的舞台。大会上并非没有对具体的局部问题的探讨，但由于大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史学交流平台，小问题的新突破往往在此难以觅得。相反，我们往往能在大会上见到史学大家的代表性观点——这些思考虽不是针对具体问题，却必定是多年治学的精华。比如，我们一定不会在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第十七章中，错过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领军人物为结构史学阐发的代表性观点。另一个例子是著名美国史学家罗伯特·R. 帕尔默。他在1960年斯德哥尔摩大会的讨论中说，以叶甫根尼·朱可夫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人类开展经济生产的“必要性”（necessity）中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问题，然而探讨此问题也可以从人的“能力”（capacity）这一视角入手。^②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所区别的是，同样是探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帕尔默以人为中心，逆向思考。这是帕尔默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他曾在著名教科书《现代世界史》的导论《地理与历史》中写道：

如果说气候与环境不仅为人类的活动设下了限制，也提供了机会，那么所谓地理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地理绝非天命。历史上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人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环境中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与各种能力。^③

帕尔默的《现代世界史》已成为现代化史学的一面旗帜，其导言虽简，却包含了一位史学家长年治史的结晶。而他在史学大会上对朱可

^① 例如 Jonathan Scott, *England's Troubles: Seventeenth - 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European Context* (Cambridge, 2000); Kenneth Morgan, *Slavery, Atlantic Trade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660 - 1800* (Cambridge, 2000) .

^② Erdmann, et al,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p. 301.

^③ [美] R. R. 帕尔默、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萊默：《现代世界史》（影印第10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版，第7页。文本由译者从英文译为中文。

夫的评论和上面这段话本质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由此可见，一些著名史学家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发言——哪怕是评论——也是长期思索的思想精华。

可以说，埃德曼的这部著作（包括科卡等人编订的英译本）不仅凝结了两代学者梳理史学大会历程的心血，也十分提纲挈领地勾勒了20世纪国际学界史学思想变动的大势，极有助于我们在更具体的史学史背景中理解每一种史学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与其他理论的互动。20世纪是一个巨变的世纪，既有世纪初民族主义的泛滥与两次世界大战，又有50年代后的东西方冷战，还有两极格局瓦解后世界各国重新携手的历程。这样一个巨变的世纪为国际上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考验，既有历史影射政治、政治操纵史学的遗憾，也有东西方许多仁人志士为公正和学术真理呼喊的身影，很值得我们不断反思。有言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阅读这样一部史学史，也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历代史学先驱追寻史德、捍卫史德的良苦用心。

翻译一部外文著作的过程，也是课题组学习、思考的过程，上述若干体会，希望能够为读者了解、阅读这部著作提供一些便利。

山东大学课题组

2015年8月15日

英文版前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CHS，法语：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CISH）成立于1926年，目前*由来自54个国家的史学会和28个附属专题委员会组成。本书记述了自1898年至2000年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委员会的沿革，勾勒了史学家之间跨国联系日渐凸显的历史，也展现了20世纪史学研究的全球性方法逐步形成的过程。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主要职责是超越民族主义，弥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互厮杀的各民族史学家间的鸿沟。自1950年至1990年，委员会及其所组织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史学家们提供了会晤、交换意见和讨论争议性话题的重要平台。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工作则反映了当前的全球化趋势。它鼓励探索跨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并努力包容全世界更多来自非西方地区的史学家。在日益全球化和普世化的过程中，历史学科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提出的问题及对问题的回应等方面都在不断变化。

本书全面记载了从1898年（海牙）到2000年（奥斯陆）于各地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议题、大事和争论，从这个角度说，它呈现了20世纪史学史的发展脉络。史学领域中不断变化的研究主题、研究

* 2005年。——译者注

视角和研究方法，为本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它也清楚地告诉世人，这一时代的核心问题与争论究竟对史学家的工作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它揭示了历史学科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也呈现了本学科的从业人员与学科组织间精巧互动的新细节。他们都在尝试跨越国家的界限，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以超越由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所造成的鸿沟；其中很多人力图建立一个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成功了，但在很多方面，他们却未能如愿。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本书原以德语写成，出版于1987年，英文版在原著的基础上略有增删。原著作者是德国杰出的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 1910—1990），他的著作主要关注的是欧洲背景下的20世纪德国史。同时，他也对欧洲以外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积极参与学者间的国际合作。他在1970年至1990年曾是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75年至1980年担任主席。^①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他广泛使用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档案材料和其他史料，既有已刊材料，也有未刊材料。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德文 *Die Ökumene der Historiker*，英文 *The Ecumene of Historians*，）书名的选择显示出他的匠心之处。他深信，历史学是一门具有普

^① 关于埃德曼，参见 H. Boockmann and K. Jürgensen, eds., *Nachdenken über Geschichte: Beiträge aus der Ökumene der Historiker in memoriam Karl Dietrich Erdmann* (Neumünster, 1991), including obituaries and personal remembrances (pp. 11–54) by E. Jäckel (Stuttgart, reprint of his obituary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2, 1991, pp. 529–539), E. Engelberg (Berlin), Th. Barker (London), J. – B. Duroselle (Paris), Hélène Ahrweiler (Paris, ICHS secretary – general), G. Susini (Bologna), H. Olszewski and J. Topolski (Poznań), D. Berindei (Bucharest), Masaki Miyake (Tokyo), Wei Hsiung (Beijing), and a bibliography of his publication by A. Blänsdorf (pp. 659–677)。在过去的几年间，关于纳粹统治时期埃德曼的态度一直存在争议，参见 (with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W. J. Mommsen, “‘Gestürzte Denkmäler’? Die ‘Fälle’ Aubin, Conze, Erdmann und Schieder,” in J. Elvert and S. Kruß, eds., *Historische Debatten und Kontrovers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Jubiläumstagung der Ranke – Gesellschaft in Essen, 2001* (HMRG Historische Mitteilungen im Auftrag der Ranke Gesellschaft, vol. 46, Stuttgart, 2003), pp. 96–109, here pp. 107–109。

世含义的科学，因此他也十分热衷于使这一学科更加“普世”（ecumenical）。埃德曼对国家、民族间的差异与冲突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书中所记述；尽管如此，他仍对历史学为促进不同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作用持谨慎乐观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他在写作这本书时，东西方对抗是当时国际关系格局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史学研究和历史书写。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和本书的作者，他把搭建两大阵营的沟通桥梁视作自己的使命。此外，他也对本学科中方法论的争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关注社会科学导向和叙事史导向之间的论战——他喜欢把后者称作“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并对其颇为赞同。^{*}

这本书就是秉承这一精神创作的，英译本的读者们必定能察觉作者的担当、要旨以及要帮助改变他所研究的时代的雄心。如今时代已经改变：我们的关切与期待可能都与以往不一样了。这恰恰证明了卡尔·迪特里希·埃尔德曼的杰出专业素养——对于史学家们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所关注的问题，本书已有重要的洞见和诠释。

已故的杜塞尔多夫大学史学家、伦敦德国史研究所^{**}长期担任所长的沃尔夫冈·J. 蒙森（Wolfgang J. Mommsen）为本书增补了“补遗”一章。在坚持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的“普世”精神的同时，蒙森把这部历史续写到了2000年召开于奥斯陆的第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大会的官方届次把1898年的第一届大会视作一次先导性的会议，xi而非第一届大会）。他把大会的历史同21世纪初所提出并讨论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

* 原句比较对象不一致。“social science-oriented historians”是“社会科学导向的历史学家”，所指是人；而“more narrative approaches”所指的是一种方法论；“historicist”和“neo-historicist”则是形容词。为使译文符合汉语语法规范，译者对句中的人和形容词统一做“物化”处理，把“social science-oriented historians”译作“社会科学中心论”；“historicist”和“neohistoricist”转为名词，译作“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译者注

** 德国史研究会是分设于罗马、伦敦、华盛顿、华沙和莫斯科的五个独立研究机构；另在巴黎、贝鲁特、伊斯坦布尔和东京还有分支协会。德国史研究会的研究重心是德国与研究会所处国家的关系。——译者注

与德文原版相比,英译本有所删节。原著有大量注释,在此有所删减。特别要指出的是,最后几章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争论与问题紧密联系,相比于现在的读者,它们对时人的吸引力更大。我们十分谨慎地删去了这些章节中的某些细节;但本书的论据、主旨和基本内容都仔细地保留了下来。删去的内容通过编者注指明了德文版的相关页码。每章标题为编者所加。附录显示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大会的发展历程,我们对此扩充,以涵盖1985年至2000年的历史;对德文版的参考文献则依照贝尔格哈恩书系的格式予以修订。最后,新近有一些著作与本书讨论的史学著作和历史思想等主要问题有一定关系,故加入参考文献中。

在20世纪90年代,身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沃尔夫冈·J.蒙森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就已经考虑和执行委员会合作,把本书译成英文。在斯蒂芬妮·默克尼希(Stephanie Merkenich)的协助和大众汽车基金会的资助下,沃尔夫冈·J.蒙森为英文翻译准备了缩减本,并把前两章译出。但由于当时没能联系上美国或英国的出版社,此项工作只好搁置下来,直到我在2000年当选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后,我才让它重新启动。沃尔夫冈·J.蒙森撰写了补遗。阿兰·诺特纳格(Alan Xlothnagle,柏林)翻译了全书。非常感谢科勒基金会(英文Köhler Foundation,德文Köhler-Stiftung im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尤其感谢基尔大学(Kiel)的史学家阿格内斯·布伦斯多芙(Agnes Blänsdorf),她曾是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写作这本书的合著者,因而对本书的写作十分了解。她在本书的缩写、改订和文本编辑方面承担甚多,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很感激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理查德·范(Richard Vann)、伊尔姆林·费特-布劳斯(Irmline Veit-Brause)和鲁道夫·费尔豪斯(Rudolf Vierhaus)这几位历史学家,他们在必要时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鼓励,也阅读了各章译文,这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帮助;感谢海德伦·迪克森(Heidrun Dickson)润饰了文本;感谢1987年出版该书的哥廷根范

登霍耶克－鲁普列希特出版社以及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的亲属霍尔斯特·菲尔柯（Horst Firker），他们均未就把本书译为英文一事表示反对。我也想向出版商马里昂·贝尔格哈恩（Marion Berghahn）表示感谢，他在向英语读者提供历史学和相关学科的德语文献方面付出甚多；也向沃尔克·贝尔格哈恩（Volker Berghahn）一并表示感谢。最后，我也要向长年支持这项工作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同事们表达我的谢意，尤其是秘书长让－克劳德·罗贝尔（Jean-Claude Robert，
xii 蒙特利尔大学）和司库皮埃尔·杜克利（Pierre Ducrey，洛桑大学）。让－克劳德·罗贝尔帮助我们更新了附录，他和伊凡·T. 贝伦德（I-van T. Berend）通读了补遗部分。

沃尔夫冈·J. 蒙森（生于1930年）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有着国际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一位研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重要专家，曾共同编订了韦伯的选集。沃尔夫冈·蒙森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对历史学科的跨国特性十分关注，在多个国际性场合上都是德国史学的代表。他多次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紧密合作。2004年夏天我们完成了本书的绝大部分编订工作，但他不能参与最后阶段的工作，也不能阅读他所撰写的补遗的修订本并对它提出建议了。8月11日，他在波罗的海游泳时不幸溺亡。他的意外离世让我们深感震惊，国际历史学界都对他深表缅怀。

——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

作者自序

历史学只能通过语言来处理其研究对象。它要有条不紊地探究那些存于往昔但现已消逝的事物，也要关照那些将至而未至的事物；所以，不管它的研究对象本质如何，它都能通过叙述把当下的现实与它所关注的问题结合起来。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都是为了问答——换言之，都是为了对话设计的。历史对话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在诸如研讨会、研究院、大学，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史学研究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又或是在地方、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等层级的历史学会中，发展出一定的、便于历史学家展开讨论的规则和组织形式。这些规则和组织形式的目的就是为此类讨论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要在这本书中详细考察的，就是在过去六十年中，作为这些讨论的组织者、支持者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CHS）和定期举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本书是一部史学史。历史学在反思其本身的成果与历史时，探索了包括传记、思想史与社会史、历史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以及制度史。后文关注的是史学家国际对话机制的发展与本质特征。考察上述问题，原因有三：（1）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内外框架，即它们机构的历史；（2）影响并决定了史学家国际对话的外部政治局势和内在政治动向；（3）反映在理论、方法论研究和大会主题中的史学研究的自我界定。在这些互动的因素中，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史学研究的自我认识。各届历史科学大会绝非经验研究、理论研究或方法论研究的工作坊。大会意义在于，与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相

xiv 关的不同观点在这里相互碰撞、交换意见，并因此反思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这样的大会把对“超越国界的史学对话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的探讨化作了现实行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史学讨论创造了机会，而其前提条件则是下述广受认可的原则：不管参与对话的史学家在语言和历史文化上有无从属关系、在理论观念上有何不同、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观念是否一致，所有的对话机会都应该为科学研究服务。

史学家们在上述诸方面越是不一致，就越有必要努力形成一种基本的思想共识；如果没有这样的共识，机制化的讨论就会失去意义。当这样的努力成功实现以后，其成果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an “ecumenic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它并非没有任何思想冲突，但从理想上说，它却是一个能够在我们这个分裂的世界里实现思想自由、包容和理解的讨论平台。

本书依据的最重要史料是大会纪要，包括删节后的参会文稿，通常也包括有关大会讨论内容的详尽报告。这些材料涉及范围极不相同，质量也参差不齐。由各届大会秘书长编纂的《公报》（*Bulletins*），对了解自1926年以来成立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CHS）的历史，十分重要。此外，许多未刊史料也很有价值。有很多材料都保存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档案馆中，其中一部分保存在洛桑、另一部分保存在巴黎。更多材料则保存在洛克菲勒文献中心、各国委员会和各附属委员会的档案馆中。一批私人文献也提供了大量信息，在涉及史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内部运作方面更是如此。各国期刊对大会的报道和评论也有一定价值，因为有关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有时不能只依靠与大会有关的史料来研究，还需要参考同时期的相关文献。但是，本书主要关注的依然是历届大会和大会主办方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发展历程。今天，已有大量的国家委员会和专门国际组织从属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但它们各自的历史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如果把它们都囊括进这本书里，那么这项研究的主题就不再鲜明了。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部简要的研究关注过史学大会的历史。哈尔夫丹·科特（Halvdan Koht）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创始人之

一曾记述过其草创之初的历史。^① 长期担任委员会秘书长的米歇尔·弗朗索瓦 (Michel François) 在委员会创立 50 周年时简要勾勒了它的发展历程。^② 我作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和主席也多次在专题演讲和论文中探讨了史学大会和委员会的历史。^③ 由于苏联对史学大会的贡献多与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 所以民主德国、苏联和意大利的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几项颇有价值的研究。^④

直到最近, 史学界仍有一些保守的精英分子以一种鄙夷的心态将国际史学大会视作“庸人之会”。尽管史学大会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它依然是一门具有生命力的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且, 它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参会者。所以, 这本书尝试从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揭示史学大会的学术意义。

① H. Koht, *The Origin and Beginn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ersonal Remembrances* (Lausanne, 1962) .

② M. François, “Cinquante ans d'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in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Bulletin d'information*, ed. Michel François,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ICHS [hereafter: ICHS, *Bulletin d'information*], no. 10 (1976) .

③ K. D. Erdmann, “Fünfzig Jahr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rfahrungen und Perspektive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27 (1976): 524 – 537; “Die Ökumene der Historiker: Rede des Präsidenten des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zur Eröffnung des 15. Internationalen Historikerkongresses in Bukarest”,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1 (1980): 657 – 666, French text in *X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Bucarest, 10 – 17 août 1980: Acts*, 2 vols. (Bucharest, 1982), vol. 1; “Il contributo della storiografia italiana ai Congressi Internazionali di Scienze Storiche nella prima metà del XX secolo,” in B. Vigezzi, ed., *Federico Chabod e la “Nuova Storiografia” italiana* (Milan, 1984);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Work in Progress,”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8 (1985): 3 – 23, German translation: “Zur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 Historikerkongresse: Ein Werkstattbericht,”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6 (1985): 535 – 553; “Genèse et début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fondé le 15 mai 1926,” in ICHS, *Bulletin d'information*, no. 13 (1986) .

④ L. D. Behrendt,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der sowjetischen Historiker 1917 bis Mitte der dreißiger Jahre: Zur internationalen Wirksamkeit der sowjet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in ihrer ersten Entwicklungsphase”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Leipzig, 1977); E. A. Dudzinskaja, *Meždunarodnye naučnye svyazi sovetskikh istorikov*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lations of Soviet historians] (Moscow, 1978); C. Castelli, “Internazionalismo e Storia: Gli Storici Sovietici ai Congressi Internazionali di Scienze Storiche 1928 – 36”, *Storia Contemporanea* 12 (1981): 908 – 926.